

# 诗意中国的根脉传承

韩经太

## 精彩阅读

■ 诗意中国的审美风貌，呈现为诗歌艺术的审美意象，延伸为诗情画意的综合艺境，涵养在礼乐教化的文化传统，进境于民胞物与的终极关怀，只有多维整合的系统阐述才能保证根脉传承的浑然一体。

■ 诗意中国的文化心理，凸显出永续不绝的唐诗情结，而今天我们对“唐诗之美”的解读阐发，更需要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全新视野。

■ 提炼凝聚着诗意中国之文化精髓的“美的规律”，需要在“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创新视域下提炼并阐释中国艺术哲学的经典范畴、核心命题以及阐释话语体系。

诗意中国的根脉传承，意味着在提炼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特定意义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诗性思维所造就的中国审美意态和中国文化精神的精华描述和精神阐释。惟其如此，诗意中国的根脉传承，不仅需要充分体味中华诗词的美感韵味，而且需要深入发掘其精神发育的文化根系和风格演变的历史脉络；不仅需要从文化生态的角度透视其所以如此的文化机制，而且需要在哲学的高度上探寻其根脉延续的美的规律。亦惟其如此，根脉传承的创造性实践就关乎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的深度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诗意中国的根脉传承，是“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推动下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课题，并且是全社会都需要提高问题意识的思想理论探索课题。要而言之，这里的问题意识须涵盖以下三种维度：一是如何揭示孕育了诗意中国之审美风貌的文化生态，二是如何解读凸显出诗意中国之文化心理的唐诗情结，三是如何提炼凝聚着诗意中国之文化精髓的美的规律。

诗意中国的审美风貌，呈现为诗歌艺术的审美意象，延伸为诗情画意的综合艺境，涵养在礼乐教化的文化传统，进境于民胞物与的终极关怀，只有多维整合的系统阐述才能保证根脉传承的

浑然一体。首先，诗歌艺术的审美鉴赏所需要的审美灵感和人文修养是根脉传承的现实基础，而这个基础的坚实丰厚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就像生命需要空气和水那样，只有相应的文化生态才能孕育中国人整体的诗性性情。为此，需要树立“精品”“精读”意识，要真正领悟中华诗词的独特魅力，尤其要在探讨诗性美之所以然方面下大功夫。继而，从中华诗词艺术中自然延伸出来的讲求诗情画意的审美文化传统，培育出诗词书画一体的艺术传统，这就向人们提出了跨越当代文学与艺术学学科界限、领悟古典诗词意境和书画神韵的综合要求。如果说中华诗词具有讲求情景交融从而也讲求诗画交融的特色，那么，伴随着诗画交融的艺术潮流，绘画艺术领域追求率意写真的“文人画”流派，不仅造就了艺术史上写实与写意的不同流派，而且延伸发展为以当代“新文人画”为标识的笔墨传统，于是也就引发了深入艺术学肌理的造型与笔墨之辩，与此相关的讨论还有待深入。进而，诗意中国植根于礼乐教化的文化土壤，在制礼作乐和礼崩乐坏的兴衰交替中动态考察诗学的发展轨迹，包括上古礼乐文化阐述中“采诗观风”的制度设计和“温柔敦厚而不愚”的人格诗学规范等，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值得探索的诗意生态学研究课题。最终，中国式诗意栖居境界凝聚着中华哲思美论的核心观念和思维范式，也因为如此，诗意中国之根脉传承指向人学本根和宇宙本源的终极关怀和哲思智慧。在这里，可以讨论诗意栖居与终极关怀的深层契合问题，可以探讨如何将“民胞物

与”的博大襟怀注入日常平凡的生活实践中，参悟文学艺术的“自然之道”和哲学美学的“道法自然”。

诗意中国的文化心理，凸显出永续不绝的唐诗情结，而今天我们对“唐诗之美”的解读阐发，更需要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全新视野。

最近，南开大学文学院联合抖音、中华书局推出“抖音短视频版《唐诗三百首》”。据《2023 抖音唐诗数据报告》，在过去一年里，近百万名网友在抖音发布唐诗相关短视频，视频累计播放量超过158亿。这一现象说明，现代传播方式在加速推广诗意中国普及事业跃上新台阶的同时，也进一步确认了唐诗在诗意中国审美心理中的核心地位。确乎如此，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目中，唐诗是美的巅峰。惟其如此，伴随着这种普及广度的数量升级，自然应有无愧于时代的探究唐诗之所以然的诗学解读。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古今一体的诗学通观视野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比较视野的彼此融通，无疑是深入透视诗歌“唐人高处”和“盛唐气象”之丰富内涵，进而把握中华诗词最美范式之生成机制的新兴机遇。尽管围绕“唐人高处”和“盛唐气象”的学界讨论已然积淀丰厚，但“接着说”的空间同样宽阔。譬如殷璠《河岳英灵集》有曰：“‘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人以来少有此句。张燕公（张说）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这无疑是唐人自己对盛唐时代精神之诗意呈现模式的自我确认。无论张说是否想借此表达政治理想与改革决心，他为盛唐时代树立诗风标杆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也就为传承不绝的盛唐气象之诗美阐释确立了经典范式。今天，当我们自觉传承如是范式阐释之际，也有必要展开富于艺术哲学辩证思维的新思考：“盛唐气象”的典型意象，难道是唯一吗？譬如那家喻户晓的《登鹳雀楼》，虽然在描写“白日依山尽”的落日景象，然而其“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精神超越意向，不也洋溢着追求更高境界的“盛唐气象”吗？进入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比较视野，如汉学家宇文所安所推许的王维诗句“落日鸟边下”，同样也是描写落日意象，其取景构思却有着超越日常经验的独特造诣。王维此诗的意象塑

造别具一种瞬刻永恒的玄妙诗意，聚焦于飞鸟与落日在审美直觉视野里偶然相遇的一瞬间，诗人分明有着捕捉直觉形象并以此寓寓“目击道存”意趣的灵感神思。须知，与此对应的下一句是“秋原人外闲”，后世对此联有“妙绝言论”，后世对此联有“妙绝言论”的高度评价，如今继续求索其妙绝言论之妙处，需要透过“落日鸟边下”这一将无限空间感融入眼前直觉印象的感物意象，从而感悟“落日”“秋原”所营造的“人外”（人的感官世界之外）之万物自在的闲适境界。这种境界，与同样出于王维笔下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以及“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隐然有着内在的契合关系。

提炼凝聚着诗意中国之文化精髓的“美的规律”，需要在“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创新视域下提炼并阐释中国艺术哲学的经典范畴、核心命题以及阐释话语体系。

在终极关怀的维度上，诗意中国之根脉也就是中华民族之哲思美论的话语根系，而构成这种话语根系的经典范畴与核心命题，堪称中华文明之精神标识，对这些标志性范畴命题的创造性阐释，是今天我们在“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视域下深入探寻马克思“美的规律”学说的创新实践。无论是从中国艺术哲学之原点的老子“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命题出发，然后一路通向庄子“天籁”说之所谓“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的哲学美学之阐释，还是将孔子“吾与点也”之感言与朱熹“‘吾与点也’之意”的阐释模式视为一个有机的思想整体，诗意

中国的哲学美学智慧和主体人格理想是高度契合的。这种被中华民族精神实践所不断证实的契合性，放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当代视域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度契合性。重温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论述异化劳动时提出的“美的规律”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深入探讨马克思两个尺度的深邃含义，领悟其中关于自由创造的人与世界万物之间完美关系的创意思路，我们将收获一把可以叩开“众妙之门”的钥匙。比如缘乎此而可以重读至今仍被视为最具难度的哲学文本之一的庄子《齐物论》。在开篇“天籁”说与篇终“物化”说前后呼应的文本结构中，篇终“庄周梦蝶”的寓言喻说未尝不是开篇“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一说的形象化阐释，当庄子最终强调“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时，其言外之意自然涵涉“吹万不同”的造物者与“咸其自取”的物自生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庄周梦为蝴蝶之际“自喻适志”而“不知周”的“物化”境界，投射到关乎“美的规律”的思想理论领域，然后再回归到“天籁”这一经典范畴的重新阐释，相信人们不难找到自身理论思考的新出发点。

诗意中国的根脉传承，是一条上下求索而去发现美的真谛的精神登攀之路。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



## 一家之言

# 探索宗教传记文学研究之转型

——张玉莲《中古道教仙传文学研究》评介

李永添

宗教传记横跨文学、历史、哲学、心理等众多学科门类。宗教传记作为研究对象，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目前学界对于宗教传记探索，多是就宗教而论宗教，或就文学而论文学，或从具体文献讨论艺术特色，缺乏一种综合、宏观的视角审视宗教传记的发展历程与叙事艺术。张玉莲副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道教仙传研究，今其《中古道教仙传文学研究》出版，是一部以道教仙传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该书以开阔的视野全面考察了中古道教仙传的形成发展脉络，深入探讨了这些仙传的故事类型和主题、原型和母题等，并评述其道教史和古代文学的深刻影响。该书从多个角度、较为全面地梳理了中古道教仙传文学发展史，弥补了目前学界尚无从文学史的宏观研究道教仙传的缺憾，采用了宗教传记文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路径。

道教仙传作为中国古代传记中宗教色彩较为浓厚的一类，以其瑰丽的想象在传记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从宏观视角考察仙传的衍生发展脉络是重要且必要的。《中古道教仙传文学研究》第一章《多源共生：中古道教仙传的形成》与第二章《中古道教仙传的脉络和特征》，以广阔的视角审视了中古道教仙传的源头问题和按展动态。这对于还原中古时期道教仙传的原始生态环境是有积极意义的，能够使研究者置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考量道教仙传的发展演进趋势。不仅如此，作者还从文学（原始神话、楚辞、早期散文）和思想（道家、儒、墨、阴阳、五行等）的角度考察了道教仙传的源头问题。接着按照历时性逻辑顺序阐述仙传的脉络和文本特征问题，最终概述中古道教仙传文学“双轮峰”的发展态势。在梳理仙传的脉络时，《中古道教仙传文学研究》用扎实的文献数据支撑论点的确立。该书将道教仙传分为两汉（形成）、魏晋至隋（成熟）、唐五代（繁荣）三个时期，将今所知仙传概况以表格形式呈现，包括仙传名称、作者、作者身份、仙传卷数、存佚状况等，直观明了地呈现各阶段仙传文学的发展动态。

对道教仙传文学发展史这串璀璨的“项链”，其中的每一颗“珍珠”都值得探究。刘向《列仙传》、葛洪《神仙传》等在仙传文学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其研究价值自不必言。对道教仙传中残存文献和亡佚文献的文本整理与作者考证，亦需予以必要关注。

若将道教仙传拆分为若干个个案逐一“解剖”，其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便是文献整理和作者考证问题。在历史志及其他目录学著作中有大量关于道教仙传的著录，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历代仙传的名称、作者、数量及存佚情况等。但只清楚这些还远远不够，还有必要通过文献考辨与整理，最大限度地还原仙传状态的仙传进行文献修复与还原。同时，对道教仙传作者的稽考也必需的。显然，这是一个庞杂琐碎而又难以避免的工程。

《中古道教仙传文学研究》以纵深的视野审视道教仙传的发展动态，在精细处又以严谨务实的态度对待可见名目的每一部作品，对这些作品中每一个个案的作者信息、著录情况、版本问题、文本内容、流传情况等条分缕析，坚持了清代乾嘉以来朴学严谨的考证态度。《中古道教仙传文学研究》将李剑国先生在小说文献领域推崇的叙录体应用到道教仙传研究中，将道教传记文本研究与叙录相结合，是一大创新之处。该书第二章《中古道教仙传的脉络和特征》按照时间顺序将各时期仙传逐一考辨，是一部关于道教仙传的“微型叙录”。这种扎实的文献考证，对道教发展史与古代小说史等相关研究向更深层次发掘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这种文献考证是建立在“竭泽而渔”式的搜罗中古道教仙传的基础之上的。虽然多数道教仙传可以

从历代目录书与后人编纂的《道藏》中觅得，然而又不局限于此。由于成书时间较为久远，中古道教传记文献——尤其是单篇流传的道教仙人别传，较易散佚而不见于诸书目，这就需要作者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爬梳整理。如张玉莲在书中所言：“除几部重要的仙传（《列仙传》《神仙传》及杜光庭的系列仙传）外，多数仙传及一些隐藏于语、录、杂传、赞中的仙传的钩稽整理相当欠缺，而这些文献恰是研究道教仙传的基础。”诚然如此，道教仙传文本搜罗与整理、道教仙传叙录与道教仙传文本研究应该是“三位一体”的，而三者之中文本搜罗与整理更应凸显出其基础性作用。《中古道教仙传文学研究》中的文献考证部分足见作者文献功底之扎实。

文献整理与叙录是文献研究的根基和基石，文学文本研究亦非常重要。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分析、探究文本的故事渊源与嬗变以及嬗变过程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与文化意蕴是文学化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宗教传记文学涉及的故事类型繁多，既包含民间文学、民俗学中的内容，也包含宗教叙事文学中的情节。《中古道教仙传文学研究》在宏观掌握道教仙传故事的基础上将之划分为“展示神异”型、“求道成仙”型、“偶然成仙、遇仙”型与“讲述重要”型四类。这种分类并非一种生硬切割，而是采用一种弹性、机动的划

分方式。其所列举四种类型之中互有交叉、有重合。

《中古道教仙传文学研究》注重“文化寻根”，作为叙事文学，仙传中的故事情节大多可以溯源至上古神话与原始巫术。但是随着时间变化，一些富有时代内涵的因素逐渐渗入仙传文本中，导致仙话中的人物、事件不断地被遮蔽或置换。于是，考察仙传的原型与母题是对其进行文学性研究的重要一环。原型和母题原非文学领域的范畴，“原型”概念最早被柏拉图引入哲学范畴，20世纪又被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引入心理学范畴，同期英国简·艾伦·哈里森和雷富引入文学批评领域。“母题”源自民间文学、民俗学范畴，是“叙事性文体中构成情节的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特定意义且反复出现的最小单元”。将“原型”和“母题”理论借用到文学批评领域（尤其是叙事文学领域）是非常适用的。

《中古道教仙传文学研究》作为宗教传记文学研究的力作，亮点不仅限于宗教传记研究思路的转型——既有道教仙传文学研究的宏观视角，又能秉承乾嘉朴学的严谨平实的精神考证具体文献，又从叙事学角度进行文化层面的归纳总结与寻根溯源。毋庸置疑，其对于传记研究、文学研究、道教史研究都有一定借鉴意义。或许《中古道教仙传文学研究》仍有不足之处，但其新颖的研究理路、扎实的文献功底是值得肯定的，是宗教传记研究的一次成功尝试。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 理论 速递

### 莫砺锋：让古典名著 焕发现代光彩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南京大学资深教授莫砺锋以《普及古典名著，弘扬传统文化》为题作了发言。日前，他在《文学遗产》撰文，阐述了对文化传承发展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学不但在艺术上登峰造极，而且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社会价值。莫砺锋表示，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无不身兼优美的文学作品与深刻的人生指南的双重身份，在陶冶情操、培育人格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事业中，中国古代文学无疑应该而且能够发挥重大的作用。我们尤其应该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指引，在普及古典名著、弘扬传统文化上作出应有的贡献。

莫砺锋认为，普及古典名著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整个学术界的共同努力。应在三个层面上开展工作：一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精神与教化功能进行深入的学理探讨，全方位地准确理解古代文学的真正价值和核心精神，以证明它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程中应该发挥的作用。二是对历代文学经典进行全面细致的整理，以及准确深刻的阐释和解说，以便于现代读者阅读和理解。三是将学术研究成果融入各类学校的教学活动，提高当代学生阅读中华文学经典的能力和自觉性，并通过普及读物、公众讲座等方式向全社会进行普及。

### 张志强：深刻理解

### “第二个结合”的首创性意义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在《哲学研究》发表文章《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首创性意义》，认为“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机制和内在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然要求进一步与文明或文化更深入地结合。如果说“第一个结合”中的文化或文明还是自在契合的对象，那么“第二个结合”中的文化或文明已经是自觉契合的内容。“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在具有中国形式、中国形态之后，还具有了中国文化生命。

在张志强看来，“第二个结合”蕴含着一种新的文明观和大历史观，确立了扬弃西方文明的、更加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文明观，确立了能够古今贯通、源流互质的历史认识论。“第二个结合”在“又一次思想解放中”全面树立起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重文化主体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第二个结合”的目标和宗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扬弃西方现代文明形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是一种坚持和发展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现代文明。

### 林茂：肩负起新时代 新的文化使命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林茂在《美术研究》发表的《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贡献》文章认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为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指明了方向。要深入挖掘涵盖造型艺术、设计艺术、建筑艺术、艺术人文等“大美术”的现代功能，充分发挥“大美术”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林茂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回信五周年之际，中央美术学院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贯彻落实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肩负起引领美术事业和美术教育事业发展的使命担当，已经启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贡献行动计划，站在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文化使命的战略高度，研究重大课题、开展重大创作、实施重大项目，充分发挥学校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着眼文明问题、战略问题、前沿问题，统领学院落实国家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目标和面向未来创新性工作。

本报记者 谢颖 整理编辑



理论速递